



一个人 一座城 一生经营 塑造一代人的艺术品位

西雅图的艺术传奇

富勒的中国艺术品收藏

姚进庄 著

何子璐 译

藝術與鑒藏

王立翔
汪涛 主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一个人 一座城 一生经营 塑造一代人的艺术品位

西雅图的艺术传奇

富勒的中国艺术品收藏

姚进庄 著

何子璐 译



藝術與鑒藏

汪涛
王立翔 主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雅图的艺术传奇:富勒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姚进庄著;何子璐译.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10

(艺术与鉴藏)

ISBN 978-7-5479-1431-1

I. ①西… II. ①姚… ②何… III. ①艺术品—鉴赏—中国 IV. ①J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0849号

本书中文版由©Seattle Art Museum授权出版
本书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资助项目



西雅图的艺术传奇

——富勒的中国艺术品收藏

姚进庄 著 何子璐 译

责任编辑 张雨婷 陆菁菁

审 读 雍 琦

封面设计 王 峥

责任校对 朱 慧

技术编辑 顾 杰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④ 上海书画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 200050

网址 www.ewen.co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sh@online.sh.cn

制版 上海文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画中画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6.125

版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79-1431-1

定价 128.00元

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藝術与鑒藏

主 編

汪 濤 王立翔

目 录

中国艺术品的鉴藏源流及其他（代序） 001

馆长献辞 金莫莉·罗莎赫 007

作者序言 姚进庄 010

导言 019

第一章 理查德·富勒——中国艺术品收藏家 027

第二章 从私人收藏到公共馆藏 059

第三章 把握新机遇 135

第四章 理查德·富勒之贡献 207

附录 225

参考文献 248

中国艺术品的鉴藏源流及其他（代序）

艺术品鉴藏的历史，与艺术的发展历史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它与人类艺术行为起源并不同步。不过人类收藏活动的源头仍可追溯至人类的原始本能时期，即早期对食物的贮存和生产资料的收藏。经过漫长的文明进化，历经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技术和文化条件支持、催化下，不断地附加并融合外在的功能，灌注了收藏者更多的动机和精神寄托，逐渐演化成为一种复杂、高级的人类社会行为。

考古发现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在距今有五千年之遥的许多重要遗址中，如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发掘出了大量精美的玉器，史家判断当时已出现了较严格的等级制度。依据就是玉器的制作，需要大量的人员去寻矿、开采、运输，大量的时间去切割、琢磨、制作，其形制之不同，更是蕴藏了丰富的寓意。玉器在当时条件下具有无比珍贵的意义：它从原始的装饰物，发展成为当时最重要的部落活动——祭祀的礼器，以及王室、贵族权力、身份象征的配饰、仪仗。因此，玉器也被认定为中华民族最早具有“鉴藏”属性的艺术品之一。

以此为起点，中国的艺术品鉴藏活动开启了至少五千余年的漫长历史。从此，中国人高超的艺术创作，与发达的鉴藏活动相伴相生，鉴藏活动的起伏，又与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盛衰休戚相关。历朝历代的艺术品为国人鉴藏活动之发育和成长，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对象，而伟大的文明进程和长期稳定的社会形态，为鉴藏活动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存在基础。中国艺术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漫长的发展时期形成了独有的根脉和系统，它与华夏民族的宇宙观念、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以及技术工艺紧密相关，特别是技术的发展在艺术创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使艺术家的奇思妙想有可能成为千姿百态的物之形态，使众多的实用器物变成了艺术品而留存于这个世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史前玉器、商周青铜、秦汉古玺、魏晋书法、唐宋绘画、明清瓷器，就如同中国文学之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般著称世界，并被公认为世界之瑰宝，艺术之巅峰。它们构成中国艺术品发展的基本源流和成就特征，鲜明地刻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更是历代鉴藏家财富和见识的骄傲，价值和精神的寄托。

伟大的艺术成就为艺术品鉴藏提供了客观条件,但作为鉴藏者的活动仍受制于外在的社会和技术条件,更与文化观念和时代风尚紧密相连,两者都深刻地影响着不同时期鉴藏者的主观思想。

在中国,鉴藏这种社会行为很早就与政治和礼制相关连,这一点与早期的艺术品功用有关,另外,因其财富的属性,它也代表了社会地位和权力意志。在物质条件匮乏的上古时期,财富高度积聚于上层社会,能有鉴藏行为的均为少数贵族王室成员。“子子孙孙,勿替引之”(《诗经·小雅·楚茨》),是他们渴望财富、地位延续的最好注脚,他们将“子孙永葆”之类的文字契刻在甲骨、礼器之上,以昭示这些宝物来到他的身边,是上天意愿,并告诫子孙世世珍惜、千秋不易。这无疑是所有既得利益者的共同梦想。因此,统治阶层为维护既得利益、保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建构了宗法等级等制度,不仅以“礼之教化”施之于民而“止邪也于未形”(《礼记·经解》),且将具怡情悦性的艺术品也赋予“成人伦,助教化”的道德教育功能,这些都成为以后统治阶层以宣示政教为主流价值观念的源头。然而社会的改革和国家之间利益的冲突,总是残酷地击破这些一厢情愿的美梦。因与财富和统治意志相关联,艺术品及其收藏者的命运也无可避免地与社会动荡共沉浮。《春秋左氏传》中就记录了大量宝物重器被频繁取用于政治外交,甚至于以求重器为借口而不惜杀伐征战的例证。

因此,中国早期的艺术品被赋予了复杂的社会职能,由此而产生的鉴藏观念也远远超出了对艺术品本身的关注,比如“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玩物丧志”“不贵异物贱用物”等等思想,都是中国早期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观念的起源,有的直接来自艺术品及其主人在历史洪流中的经验教训。最为著名的例证就是“和氏璧”,它的传奇命运,堪称是所有鉴藏故事中的极致代表,它承载了人类由鉴藏而生发的几乎所有的思考和情感。

早期史籍中大量涉及宝藏流转的相关记载,一方面说明春秋时期艺术品的藏、用活动进入了一个繁盛时期;另一方面,则体现了鉴藏观念与统治者利益和意志密切相关,它影响了社会的价值观念甚至国家行为。

值得一提的还有魏晋南北朝时期。彼时中国大地进入政权交替割据的局面,中原大批人口,尤其是社会精英多迁徙江南。因大一统的政治、军事格局被打破,独尊的儒学失去政治的庇护而大为颓弱,文化思想迎来类似战国时期那样的自由活跃环境,其中以玄学和佛教思想分别赢得知识和世俗阶层的推崇而风行尤甚。在这三百余年间,主要在南方,文化艺术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物质和技术条件支持下,以卷轴书画为主要鉴藏对象的艺术作品为更多的文人雅士所推崇,鉴藏活动冲破了统治阶层的权贵屏障。他们以卓越的才华,乘文事之盛,将文学、人物的品藻之风与艺术鉴赏相联系,大大开阔了艺术品鉴藏的审美视界和精神疆域,丰富了秦汉以降对艺术品功能、价值的认识,影响了此后历朝上至帝王下至民众,尤其是占艺术品鉴藏活动主体的士大夫群体,成为以后中国艺术品鉴藏的重要特征和理论体系的核心。

如前所述,中国鉴藏史的跨度大约有五千年之久,而其间因为史料遗存和获得的不一,我们对各时期的认识也差异甚大。但大致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观察其发展流变的总体状貌。

1. 皇家收藏，是历代鉴藏活动的主体。

早期的艺术品从其基本特性中延伸的品类群生、彰显教化、煊赫治功的功能，就是王权有意宣示的各种表现，因而为帝王所看重。而随着艺术品形象、直观、美化、娱情等艺术本体特性发育得愈加显著，艺术创作的精神性沟通和悦目游艺的自由抒怀，得到了鉴藏者，尤其是王室的更为充分的认识。历朝帝王，尤其是那些对艺术品抱有浓厚兴趣、鉴赏眼光高人一筹的帝王，把以强权而“富有天下”视作天经地义，他们利用地位和权威，建府立制，或笑纳各方朝贡进献，或收罗天下珍品异宝，充栋内府禁苑；或调集天下名工巧匠，以为己用，形成以礼制政教为主体的“官家”宫廷艺术；他们的作为和标榜，直接影响了当时及后世鉴藏活动的方方面面。因此，中国历代的鉴藏活动的主体是皇家。这一现象无论是传世艺术品自身，还是在各种史志、著录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2. 文人风尚，引领了民间私藏活动的潮流。

与皇家相对应的是民间，不过这个鉴藏群体的主要构成是贵族、官宦和富商，一般平民布衣是无法跻身这个以财富为基础的特殊领域的。这其中，文人士大夫是这个群体的意见领袖，他们有的以开阔的知识视野、深湛的学问根蒂、较高的艺术品位，不断探寻和开掘了鉴藏活动的内在精神世界；有的甚至亲身参与艺术创作，将思想趣味与艺术表现相融合，标榜艺术品的文化价值，分野雅俗之间，形成了不同时期的风尚。知识阶层大范围介入艺术品鉴藏活动，也起端于魏晋时期。从此，鉴藏活动与文人结缘。知识阶层的介入，大大推动了鉴藏活动内涵的完备和形式的丰富。如齐梁谢赫、北周姚最等一大批具有品鉴眼光的文人士大夫从事书画鉴藏活动，不仅开启鉴藏著录一科，更大大推进了艺术品鉴的实践总结和理论研究。及至北宋欧阳修、赵明诚、吕大临等怀经史之才，以金石学开启了鉴藏研究的崭新门径，且为鉴藏学规范的确立建有筚路蓝缕之功。到了明清两季，随着手工业的发达、海外贸易以及地下碑刻器物出土的增多，公私鉴藏异常繁盛，受朴学的影响，一些阁僚高官和学界大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学术探究、引领鉴藏的作用，如文徵明、钱谦益、翁方纲、阮元、何绍基、陈介祺、吴大澂等都成为知名的学者型鉴藏家。文人士大夫在鉴藏活动中地位的不断凸显，与他们在中国社会阶层的地位变化极为有关。

3. 鉴藏活动的盛衰，与历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轨迹密切相关。

纵观历朝的艺术品鉴藏之发展，每逢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正是鉴藏活跃发展的大好时期，而鉴藏的重要对象——各种艺术品，包括字画和瓷器、铜器、玉器等各种古器物，本身也是前、当代社会昌明文化发达的结晶，这印证了与艺术有关的技术条件和创作水平的不断提升。鉴藏活动开掘了艺术品的经济价值，推进了艺术的实践探索和与之相关的工艺发展，对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随着财富特性的愈加彰显，艺术品也诱发着人类本性中自私、奢靡乃至贪婪的阴暗一面，因而随之产生了巧取、豪夺、贿赂、厚葬、盗墓、作伪等等与鉴藏相伴随的种种肮脏行为。

4. 皇家鉴藏高度聚集,造成中国历代艺术品亦得亦失

如前所述,历代鉴藏活动是以皇家庋藏为中心。数千年以来,历代帝王一直视中华为文明之邦,有着崇尚文物,聚蓄典籍、宝藏的传统。《历代名画记》所记汉武帝“创置秘阁,以聚图书,汉明(帝)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创鸿都学以集奇艺,天下之艺云集”,或许是史料记载下的皇家首次大收藏行动。后代的帝王纷纷效仿,尤以新朝初立为甚,并不断在体量上扩充,以至天下宝物,收罗殚尽。如此高度聚藏的结果,就是所藏文物命悬国运,而最终等待的是王朝倾覆、累世所藏毁于一旦的悲剧。类似浩劫几乎每遇重大战乱、帝都失控之际,历朝都会悲剧重演,屈指数来,宫廷庋藏之殇,竟有十次之多,而造成的损失,实是华夏文明的一次又一次灾难。宫廷收藏是封建帝王专制统治下的必然产物,作为鉴藏史之主要构成,其始末成因,所得所失,洵足后人深刻探究和反省。

5. 分野于鸦片战争的中国艺术品域外鉴藏

无论是从中国鉴藏史的完整性还是从世界文化交流的不同视角来看,域外中国艺术品鉴藏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这些区域、国家与中国的历史渊源和当时关系各不相一,所受文化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因此鉴藏的情状也各不相同,对这些情状的研究有助于认识中国艺术品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和意义。

域外鉴藏首先要研究中国的艺术品是如何“走出去”的。中国虽然西困高原沙漠,东濒滔滔大海,但艺术品鉴藏活动的范围绝不仅限于中国本土,最为著名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交通,分别最晚于秦汉完成了与周边邻国的沟通。借助贸易和外交活动,中国艺术品必然早早地担负起文化、经济交流的使命,丝绸、瓷器因最受域外民族的欢迎而成了中国制造的主角,甚而演为中国的代名词。到了盛唐,对外贸易线路发展到了七条之多,距离、规模均创空前。虽然丝路海上此消彼长,但中国艺术品出口的态势基本未变。直至鸦片战争,国门被西方船炮彻底轰开,贸易主导的方式完全颠倒,域外中国艺术品鉴藏活动的性质截然改变。与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换一样,鸦片战争(以圆明园劫难为标志)成为中国域外鉴藏活动的转折点。

1860年的圆明园劫难,不仅导致了这座旷世园林和一百五十万件艺术品直接被损毁劫掠,更开启了近世中国文物不断流散的噩运,成为中国鉴藏史上最大的一次浩劫。就在清王朝命数将绝之时,又先后发现了震惊中外的殷墟书契和敦煌宝藏,正值动乱的中国无力看护这些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重大发现,仅敦煌文物就被英、法、俄、日、美等国以多支探险队名义巧取掠走至少二万六千余件。进入民国,仍国事动荡,战乱连绵,从出土到传世,从故宫到民间,国内外各种势力和个人利用抢掠、偷盗、贿授、骗夺、私贩、交易等种种手段,导致中华文物频频流向海外,以至无法计数。所幸的是在此间最大的两次战争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国艺术品最重要的遗脉——皇家珍藏,历经万险,虽此后海峡相隔,但大体未损,仍在中华子孙手中,也算创下一个鉴藏史上最庆幸的奇迹。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动荡逾百年的一段伤心史终于画上了句号。

中国艺术品身处异邦的命运及其产生的影响，是鉴藏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从近世算起，中国艺术品在域外的历史也已经将近有两个世纪的历史了。在如此漫长而又背景不同的历程中，尤其是在近代以来付出惨重代价，我们历数那些人和物，心中不由泛起复杂的感情。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艺术成就逐渐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尤其在今天，中国综合影响力的上升，更推动了中国艺术品珍贵价值的再认识。客观上，域外的中国艺术品收藏，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明成就一起，汇聚成了人类共同进步的光环。

我们梳理了中国艺术品鉴藏的一些源流及部分特性，就可以感受到“艺术品鉴藏”一门，有着极其丰厚的内容和复杂的历史轨迹。它可能由物（艺术品）或人诱发一段机缘，产生复杂的事态、感情甚至思想，由此开启一段物（艺术品）的“生命”历程。这一“生命”也许片刻夭折，也许顽强地生存且超过几十代人总和；它与它的不同主人恩恩怨怨，历尽磨难，也犹如沧海一粟，见盛观衰，尝尽世态炎凉。它诞生于一方特殊的土壤，满身中国的基因，读懂它、鉴别它、珍视它，需要与它一样植根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之中；评估它、研究它、欣赏它，需要积聚它历任主人的学识素养，并发扬超越前人的才华智慧和无微不至的爱心。

中国艺术品鉴藏就是这样一项富有神奇魔力的人类活动，它贯穿鉴别、流通、皮藏、欣赏等多个过程，每个过程既与艺术创作发展及其精神诉求有着紧密的关联，又有其自身的内在特性和规律，都需要专业手段和学科知识的支撑，涉及诸如历史、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心理等等领域，拥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和精神世界。中国艺术品鉴藏历史如此悠久，近十几年来也已成为十分热门的行为和受关注的话题，但深入关注鉴藏内涵和史实研究的工作却并不多，而呈现出鉴藏界人士追逐利益多、鉴藏行为鱼目混珠多、问题研讨浮于表层多的现象。中国的鉴藏研究必须要向更高的学术水准发展，或有以下几项工作亟须得到学界重视：

1. 加强符合现代学术规范和体系要求的鉴藏学科建设。

如上所述，与鉴藏学有关的领域如此众多，那就意味着它必然是一门交叉性学科，需要足够开阔的学术视野、结构多元的知识作基础，去总结传统的鉴藏学问和手段，吸收其他成功学科的经验，逐渐架构起一整套严谨的系统方法。这项工作在中国起步晚，虽有诸多有识之士推动，但相关的教学或研究往往仍限某一局部，尚未迈出整体的、学科建设性的步伐。

2. 加强追踪、梳理世界范围内中国艺术品的往世今生，加快挖掘、整理相关的历史文献。

这是鉴藏学科发展和研究的基础。如上所述，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艺术品散失的情况非常严重，今人应利用各种条件弄清历史上和现存的中国艺术品状况。另外，有关中国鉴藏方面的文献，总体上呈前疏后详的特征，如何去伪存真，辨析纷乱的信息，相关专家应继承、发扬中国学术传统，系统整理史料，开掘传统著录之外的海内外新文献，以便今人站在前人肩膀上，去接近历史的本相。

3. 要融会相关的学术成果,运用客观的史观、严谨的方法,将个案研究和宏观论述相结合,来系统梳理和总结中国的鉴藏史。

一方面,我们要将鉴藏史放入中国历史之中,在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下,去探寻接近人(收藏者)一物(艺术品)一事(过程)的真实,去追寻它们之间的关系、缘由和潜藏的意义。另一方面,我们要用更宏大的视野,将中国鉴藏史放置于世界的格局中,去直面、探寻、记录、辨析在异乡他国的中国艺术品鉴藏的行为、过程及其理解、认识,去审视中外有关鉴藏文化的差异,这其实是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在世界中之价值命题追问的延续。

4. 要从艺术与鉴藏之间的关系,来审视两者的相互作用。

艺术品是鉴藏的对象,在一定条件下,其作用关系发生互换。鉴藏的主观意愿或形成主导,或形成群体风尚,又作用于艺术品的创作随着鉴藏者欣赏口味的变化,艺术创作的审美趣味、创作观念、方式风格都会产生相应的变化。而随着鉴藏活动的深入,艺术作品价值的提升,艺术品的作伪和鉴伪也应运而生。艺术与鉴藏之间,在不同时代,产生了无数的案例和话题,是鉴藏一门需要花大力气去梳理、研究的课题,也是对当今鉴藏活动最有现实影响的主题。

艺术品鉴藏是一种社会活动,也是一种精神活动。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的中国艺术,以其独特的呈现方式屹立于世界之林,并以其东方精神,滋养着每一位与它相视而会意的观者、藏家。这就是中国艺术品鉴藏的魅力所在——人与藏品达到“相知”“通神”的境界。鉴于中国艺术品鉴藏其内涵如此之丰富,而与之有关、亟须去展开的工作如此之多,我们从三年前就开始探讨如何搭建平台,搜寻、组织、出版海内外史料翔实、史论交互、方法新颖、主题鲜明的高质量研究著作,为开掘尘封已久的史料,厘清错综迁延的鉴藏史脉络,寻绎和逼近历史真相,尽些所能。如今终于迈出实质性一步,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在这里,我们要感谢所有参与者的倾情付出,也期盼海内外更多的学界朋友,来为中国艺术品鉴藏研究的深入,做出共同努力。

主 编

2014年3月

馆长献辞

顾名思义，本书将以全新视角探究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中享有盛名的中国艺术藏品，而这些藏品皆与创馆馆长理查德·富勒（Richard E. Fuller）博士息息相关。虽然富勒博士的藏品常常被誉为全美最佳中国艺术馆藏之一，但由于富勒博士讷言敏行，行事低调，以致大部分藏品的渊源至今仍不为人知。富勒博士在晚年曾亲自撰写了一部值得细细品味的回忆录，后人才得以对他的所思所想有大致的了解。然而，富勒博士的藏品记录主要为他与古董商之间礼貌性的公函往来，因此难以从中得知他对于这些藏品的期望以及寄托在它们身上的梦想。

姚进庄先生于2006年至2013年担任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中国艺术部主任。在缺乏其他资料的情况下，他深入研究博物馆的藏品档案和账本，将富勒博士的收藏方向按年月顺序编排，同时分析个中原因。由此，姚氏成功梳理出富勒博士历年来的收藏模式、与相熟古董商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某几类艺术品的偏好。熟悉当今中国艺术品市场的读者或许不大知道，在二十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中国艺术品的市况与现今火热的局面大不相同。对当时的西方人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市场，只凭极少数的古董商支撑其发展。富勒博士显然注意到查尔斯·朗顿·佛利尔（Charles Langdon Freer）和摩根（J. P. Morgan）等中国艺术品收藏先驱的存在，但他没有随波逐流，加入竞争，而是凭着他引以为傲的判断力，成功构建出在他心目中与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相称的中国艺术品馆藏。

与许多收藏家一样，理查德·富勒为收藏界带来了别具一格的收藏方式。1919年的亚洲之旅令富勒大开眼界，并对他之后的收藏道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后，收藏成了富勒的个人爱好。富勒当时主要收藏玉器，特别是那些在中国备受推崇、但价格又比其他艺术品便宜的玉雕。坚硬的原石经艺术家的巧手呈现出千姿百态，这让受过地质学训练的富勒为之着迷，进而收藏了不少玉器。

1933年，理查德·富勒以自己的资金和母亲玛格丽特·富勒的捐款创建了西雅图艺术博物馆。此时他已决定发展公共馆藏，开始收购织品、瓷器和一流的佛教雕塑。随着大量新品涌入西

方市场,富勒是否购藏某件艺术品取决于三方面的考虑——个人经验、财务预算以及他对这所刚起步的地区博物馆所抱有的期望。他的个人品位一直影响着馆内中国藏品的构建与发展,这从藏品至今多为器物,而非传统地位较高的书画便可见一斑。

在理查德·富勒担任馆长的四十年里,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藏品不断从中国艺术延伸至其他范畴,其中包括日本艺术、美国西北部的现代艺术、欧美绘画和装饰艺术,正是这些藏品为博物馆现今的国际化馆藏奠定了基础。即便如此,富勒对中国艺术的兴趣从未消减。在西雅图艺术博物馆最初的数十年里,添置中国藏品可谓博物馆每年的头等大事。后来随着市场变化,富勒的购藏活动也相应减少。他曾在1961年反思道:“今时今日,能与我馆馆藏相媲美的艺术品在坊间已不复见,而我们购藏这些艺术品的时候,正是收藏它们的最佳时机。如果我曾经认为自己过去有些奢侈的话,现在我就知道那时的我是多么的明智。”(1961年1月29日《西雅图时报》)

富勒博士在博物馆服务数十载,一直以一己之力收藏优秀中国艺术品,而他的步伐也不免有放缓的一天。然而,他在任期内影响并带动了一批批善长仁翁,他们不断将重要的中国艺术品慷慨赠予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富勒博士在1973年卸任退休后,这些善举仍一直持续。多年后,前任馆长兼中国艺术专家倪密(Mimi Gardner Gates)购入了一批重要的书法作品,为已有馆藏填补空白。姚进庄先生则在他七年的任期内,集中收藏现代中国书画。多年以来,馆内藏品一直持续增长。踏入二十一世纪后,博物馆更收入蔡国强、张洵和艾未未等当代艺术家的作品。理查德·富勒若是泉下有知,大概会难以理解这些艺术家前卫的创作手法,不过只要细心一想,便不难发现:将近一世纪前,富勒博士所热爱的虽是传统中国艺术,但它们其实与这些当代作品有着深厚的联系。

凯瑟琳·阿根·巴拉格朗基金会(The Katherine Agen Baillargeon Endowment)、彭德尔顿与伊丽莎白·凯莉·米勒慈善基金会(The Pandleton & Elisabeth Carey Miller Charitable Foundation)以及罗兹与利昂娜·卡彭特基金会(The E. Rhodes and Leona B. Carpenter Foundation)对本书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对此尤感荣幸。而本书能在纪念富勒博士和庆祝博物馆建馆八十周年之际出版,全赖两位与博物馆结缘甚早的女士无私协助,她们是凯瑟琳·阿根·巴拉格朗女士(Katherine Agen Baillargeon)和伊丽莎白·凯莉·米勒女士(Elisabeth Carey Miller),在此一并致谢。凯瑟琳·阿根·巴拉格朗女士与理查德·富勒先生同为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创馆成员。巴拉格朗女士在1991年之前一直担任博物馆理事,而巴拉格朗家族本身也和富勒家族交往甚密。以慈善闻名的伊丽莎白·凯莉·米勒女士同样是富勒先生的朋友和本馆的赞助人。除此以外,本人还要感谢J. M.卡普兰基金会(The J. M. Kaplan Fund)的“向前走”(Furthermore)项目对于本书的支持。

最后,我要感谢姚进庄先生为这项研究工作所做出的贡献和努力。姚先生接受了一项艰难的挑战:试图去剖析一位备受尊敬但又低调内敛的公众人物。出色的文献研究、对富勒先生旧识的访谈,但更重要的是本书作者对艺术品本身的敏锐理解,皆为我们了解富勒先生这位绅士兼大慈善家的艺术品位,提供了重要线索和有力证据。它们将在接下来的篇章里,引领读者全面认识富勒先生于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建立的中国艺术藏品宝库。

金莫莉·罗莎赫 (Kimerly Rorschach)

馆长兼首席执行官

作者序言

近年来，众多学者曾向西雅图艺术博物馆查询其亚洲藏品的发展情况，可见学术界对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亚洲艺术收藏史兴趣日浓。本书旨在探索博物馆创始人理查德·富勒博士与中国艺术的漫长缘分。这份因缘始于二十世纪初，终于1976年富勒博士去世前夕。

西雅图艺术博物馆有幸持有富勒博士早年的购藏记录，其中包括不少退藏艺术品的资料与图片。全靠这些珍贵的资料，我们得以了解富勒博士的收藏重心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的。为了重构富勒博士的收藏模式以及他的中国艺术鉴赏观，博物馆的年鉴、馆方档案，以及富勒博士亲友的访谈内容和他们所拥有的相关资料，都是本研究的重要资源。博物馆的年鉴和馆方档案皆容易取得，但其他资料却是可遇不可求，例如我曾在理查德·岗普（Richard Gump）的《玉器——天之石》（*Jade: Stone of Heaven*）一书中意外发现富勒博士亲笔写下的注解。（作者按：该书原为富勒所藏，后来入藏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图书馆。）他不但对书中的众多观点做出回应，还留下了自己对书中玉器的评价。

除此之外，我还整理出一份清单，里面囊括所有曾经入藏以及现为馆藏的中国艺术品。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富勒博士一时的奇思异想、他对于某些艺术品的质疑、他深思熟虑后的抉择或是失之交臂的机会等等，而这些因素皆与其典藏如何成型有所联系：当时有哪些艺术品出售？它们的售价又是多少？富勒博士偏爱哪类艺术品？他的收藏偏好有否受某人影响？这些问题都可以在这份清单中寻得线索。

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富勒早年藏品的交易记录相当零散。能够提供卖家名称、购藏日期、退藏日期（如有）、馆藏编号（如有）、藏品说明和价格等关键资料的第一手材料主要有六大类，它们分别是博物馆数据库（TMS）、博物馆亚洲艺术部的藏品资料夹、账本、卖家档案、玛格丽特·富勒购藏记录卡（Margaret Fuller Purchase Cards），以及博物馆（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登录处的亚洲藏品记录卡。在以上材料中，富勒博士的母亲玛格丽特·麦塔维苏·富勒（Margaret MacTavish

Fuller) 所整理的购藏记录卡最为关键,它们有助了解富勒博士的收藏喜好以及收藏模式。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现藏逾700张购藏记录卡,全由玛格丽特·富勒亲手填写,记录了她与儿子理查德·富勒共同购入的每一项藏品。这些卡片通常含有一张藏品缩略图,伴以简单描述、藏品来源/卖家姓名、购藏日期和尺寸,并按藏品材质分类存放。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购藏记录卡向我们展现了富勒母子编排藏品资料的形式。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二人当时所藏艺术品的明细、他们对这些藏品的了解程度以及藏品尚待填空补白的部分。

实际上,这些资料所依循的整理原则并非各不相同,而它们在内容上也多有重复。再者,这些记录往往并不完整,因为富勒博士在书信中提及的部分藏品在馆内并无记录。除此之外,部分资料可能有误。(比如一个西汉彩绘大瓶同时拥有35.115和37.1两个馆藏编号,而我们已无法得知此瓶到底是在1935年还是1937年购入。)尽管如此,我从逾3500项交易记录(其中超过3000项属于富勒本人)中筛选出一批实证资料,其年代横跨1915年至2012年,足以作为极具意义的讨论基础。

一般图录习惯将向读者逐一介绍艺术杰作,但本书选择以不一样的方式展示富勒藏品中的精品。我尝试透过艺术品入藏时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凸显它们的“珍贵”之处,而收录在附录中的藏品也不一定等次较低。此外,我还会从藏品的真伪、断代和风格特点这几方面,亦即艺术史研究的典型视角,重点分析一些不常见、甚至存疑的藏品。本研究并不旨在为尚待研究的众多馆藏下一定论,但我希望本书至少能引起读者的关注,希望各位能多留意这些对富勒博士而言意义重大、却甚少享有展出或发表机会的藏品。综上所述,这是一本与众不同的艺术专著——不以艺术家的生平或艺术品的风格嬗变为切入点,而是以一位资源有限却高瞻远瞩的收藏家作为研究重心。富勒博士认为博物馆藏品是文化与文明的载体,因此藏品水平的提升有助观者进一步了解它们背后的文化底蕴。秉持着这样的理念,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中国藏品的水平才得以不断提升。

西雅图艺术博物馆长期以来一直为自己的重点藏品出版图录,其中包括《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之亚洲艺术》(*Asiatic Art in the Seattle Art Museum*) (1973)、《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之亚洲艺术:收藏五十年》(*Asian Art in the Seattle Art Museum: Fifty Years of Collecting*) (1983)、《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之象牙藏品》(*Ivorie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Seattle Art Museum*) (1987)、《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之早期中国金属器物藏品》(*Early Chinese Metalwork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Seattle Art Museum*) (1989)、《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之中国玉器藏品》(*Chinese Jad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Seattle Art Museum*) (1989)、《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之早期东亚漆器藏品》(*East Asian Lacquer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Seattle Art Museum*) (1992)、《怡情之瓶:塔尔所藏中国鼻烟壶》(*Bottles of Delight: The Thal Collection of Chinese Snuff Bottles*) (1998)、《瓷器的故事:从中国到欧洲》

